

南洋华侨早期国语推广刍议^①

李计伟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华文教育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610)

【关键词】南洋；早期；华侨；国语推广

【摘要】东南亚是全球华语研究的重点区域。文章从缘起、机构、效果、影响等四个方面梳理了南洋华侨早期国语推广的基本概况。根据文献，总体而言，南洋地区华侨早期的国语推广或者华校的国语教学是一种传承语教育，国语推广奠定了今日东南亚华语书面语的基础。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将海外华语的形成、现代汉语的发展、传承语习得等课题结合起来，从而对海外华语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更为清楚的认识。

【中图分类号】H1-09；H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174(2020)02-0021-10
DOI:10.16131/j.cnki.cn44-1669/g4.2020.02.004

1. 引言

“国语运动”是20世纪中国语言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黎锦熙先生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曾撰写《国语运动史纲》(2011/1934)一书，来总结“国语运动”的发展过程以及其中的种种争论。但该书仅限于当时中国境内的国语推广，并未涉及华侨众多的南洋地区。时至今日，我们对彼时南洋地区华侨国语推广的相关情况依然缺乏有足够史料支撑的全面认识；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补充《国语运动史纲》，更关系到对包括新加坡华语、马来西亚华语等华语变体在内的东南亚华语这个全球华语“中圈”(王惠，2007；吴英成，2010：85)形成、发展的理解与认识。

李宇明(2017)指出，大华语之现今状态，与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规范建设和传播历史密切相关；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海外华人社区也在一直跟队而行。苏培成(2010：73-74)提到，1926年在北京

举行的国语研究会十周年纪念会，南洋各埠华侨均有代表参加。别必亮(2001：118-130)论述了南洋华侨学校在国语推广方面的部分情况。姚敏(2017)在论述清末、民国政府时期的华文教育政策时，偶尔提及了“海外侨校语言问题”。可以说，关于南洋华侨早期的国语推广状况，这些叙述还是简略、不全面的，尤其是考虑到侨民人口数量、代际传承、侨民汉语南方方言背景、多元语言文化环境、所在地殖民统治的教育制度等诸多因素，南洋华侨的国语推广必然有其独特的地方，其效果也必然受到上述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拟通过对《新国民日报》等早期华文报刊相关文献的搜集、整理，从“缘起”“机构”“效果”与“影响”四个方面，较为全面地论述南洋华侨早期国语推广的基本状况，为“全球华语史”(刁晏斌，2007)研究做些基础工作。

本文的主要材料来自《新国民日报》(具体引例中简称“《新》”)。《新国民日报》创办于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檳城的《光华日报》

【收稿日期】2020-03-25

【作者简介】李计伟(1978-)，男，河南西华人，博士，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语法、海外华语及华文教育。电子邮箱：yuyantiaozao@sina.com。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华语语法研究”(11&ZD128)；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境外华语资源数据库建设及应用研究”(19ZDA311)；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海外华语资源抢救性搜集整理与研究”(19AYY003)

①感谢郭熙教授、李宇明教授和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文中疏漏概由本人负责。

南北呼应，是研究中国现代史与战前新、马乃至整个南洋地区华人史的珍贵文献。我们查阅的《新国民日报》的时间跨度为1919—1933年，这是国语运动最为关键的阶段，在南洋同样如此，比如马来西亚学者徐威雄（2012）就认为，1919年到二战前后，是马来西亚“华语史”的“国民教育普及阶段”。在此期间，该报保存连续、完整，其固定栏目“本坡新闻”与“华侨消息”基本涵盖了整个南洋地区，多有关于国语推广及华文教育的信息，这是本文选择以其为材料来源的主要原因。

2. 缘起

一个国家国语的选择、标准的确立以及推广，是语言规划的重要工作。中国国语运动中，南洋华侨在教育、报业人士及爱国侨商的呼吁、推动下，积极、主动地将“国语”在“五方杂处”的“异域”推广开来。

关于南洋华侨国语推广的缘起，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浓烈的爱国合群之心；二、优越的文化心态；三、巨大的语言歧异。第三点是当时中国与南洋地区共同的，也是国语运动的主要动因之一。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南洋华侨多为闽、粤两省移民，其语言的歧异远甚于国内，并且由于侨居海外，语言的互通、统一关乎国家认同、族群团结等，这也让南洋华侨社会将对语言歧异的认识与爱国、合群联系起来。

我们知道，近代兴起的国家主义（nationalism）从一开始就与语言密不可分，语言被认为是国家或族群认同的特殊外显标记。保存及推广语言，是维持这种认同的重要方法。Edwards（1985：46）指出，少数族群成员多有认同危机，因此可能会比多数族群成员更为强调其族群性。所以，对于上文提及的前两点原因的认识，除了国家主义在近代的广泛流行，还要充分考虑到侨民的少数族群身份及其认同焦虑；这种焦虑在其看到随着代际传承下一代有被同化趋势及土生华人多被完全同化的时候，尤为强烈。

先说第一点，浓烈的爱国合群之心。

早期南洋地区为英、荷等国的属地，侨民入籍者少，“漂泊”“寄居”心态较重，对祖国的思念、眷恋亦较为浓厚。“我们虽则侨居在

这南洋地方，但是我们的根本究竟还在中国。……现在虽则在英、荷两国的属地上做事情，到底是个寄居的客人。……譬如一个瓜蔓，蔓延到很远的地方，然而他的根依旧长在这块土上。这块土或是坏了，被水没了，被火烧了，仅是这瓜蔓离得极远，长得极茂，也是立刻会受影响，枯槁死的。”（社论《例言》（续），《新》1919-10-2）

南洋华侨将爱国情感与语言统一、国语推广紧密联系起来，冀望以语言来团结国家和族群。在《新国民日报》上，一些“时评”“社论”及关于华社的新闻乃至广告，都从爱国合群的角度阐述了学习国音、国语的重要性。如“韩立中君以国音为爱群爱国之媒介，而不可不多多传习也。”（《国音夜学又多两处》，《新》1922-10-26）“保存国性之本国语文，应先顾到。”（《（泗水）全侨大会详情》，《新》1927-4-29）“仰即通令各校，一体以国语部教授儿童，以一语言而存国性。”（《学校教授宜用国语》《新》1929-9-28）“尤其是咱们侨居海外的同胞，寄人篱下，五方杂处，统一语言，更加要紧。”（《南洋中华国语统一总会发起人大会议》，《新》1930-4-1）语言的学习需要动机，主要的工具性动机就是有用，面对南洋早期国语在社会场合使用不多之情状，甚至有人提出，对于“国语”，“吾人宁可会而不说，切不可根本不会”（《华侨国语学校开校典礼纪盛（一）》，《新》1930-1-6），这就完全出于爱国与族群认同等传承动因了。再来看一些有代表性的说法：

（1）非提倡国语无以团结民族精神，非促进国语教育无以发扬中国文化，提倡国语是中华国语学校的使命，统一国语是个个中国人的责任。（《统一国语运动》，《新》1920-2-11）

（2）合群！爱国！不知道国语怎么可以呢？外人谓中国人如一盘散沙，就是我们有省界乡界、言语不统一、没有感情的缘故！诸君，你爱国吗？爱群吗？可以不学国语吗？（《国语、注音字母、白话文法》，《新》1921-4-1）

新加坡华侨国语学校创办人张贞樑在《新加坡华侨国语学校第一周年纪念特刊（一）》（1931）“发刊词”中这样写道：“本校创设之宗旨，在使土生侨胞，先从读国文说国语，然

后进而赏识宗邦文化，而增其爱国之心，以免数典忘祖，长沦外化。”这里重点提到了“土生侨胞”这一特殊群体。“土生侨胞”就是屡见于南洋早期报章的“土生华人”；所谓“土生”就是在南洋当地出生的。就语言能力而言，一些土生华人不仅不谙国语国文，有些甚至连母方言也丢掉了，因此常被认为“沦于外化”。“生平颇伤心于土生华人不谙中华华语，数月前自解义囊，特倡‘中华国语夜校’，以教彼土生人。”（《热心家逝世》，《新》1923-4-11）由此可见，要避免被同化、保持对国家的认同，学习国语是重要手段。

再说第二点，优越的文化心态。

南洋早期的华侨自认在文化上是优越于当地土著居民的，比如马来人（巫人）。由此出发，“着巫装”“说巫言”“入巫校”就被认为是自甘堕落，“着华服”“说华语”“读华校”则被认为是爱国、保持族群优越感和传承优秀民族文化的表现。整个南洋地区，情况均是如此；在关于缅甸、菲律宾、暹罗（今泰国）、安南（今越南）等地的报导中，均能见到类似内容。

从认同的意义上讲，语言与服装一样，同为外显的认同标记。在早期南洋地区的一些新闻报道中，华人着他族服装，与说他族语言一样，被认为是一种“自弃”行为，关乎国体。比如《妇女爱国》（《新》1919-10-4）这则新闻就提到了华侨妇女穿马来服装的问题：“南洋某埠，近有爱国份子，睹妇女巫装有损国体，时向稍开通男女界演说，……盖此等装束，为巫人服制，非中国衣冠。识者忧之，吾国虽弱，尚有文化，何自弃乃尔。”至于使用他族语言和入读他族学校，在一些人看来则堪称“沦于夷狄”了。例如：

（3）嗟埠马踏地也，廿余年前，野蛮不堪言状，……近复设有巫文学学校一所，……不料有华人某甲，素称文明，家亦中资，因贪学费之廉，舍华校而入巫校，甘心子女与马踏为伍，非下乔木而入幽谷欤？！（《胡为弃华校而入巫校》，《新》1919-10-29）

（4）暹罗六坤埠，我国人侨居其地者，不只万余，成家致富者，颇不乏人。惟衣食住居，以及交际礼节，多颇暹俗，读暹书，说暹话，与土人毫无界别。揆厥原因，皆由未受祖

国教育所致。近闻有热心家某某君等，恐优秀华胄沦于夷狄，特提议创办华文学校，普施祖国教育。（《六坤有创办华校之提议》，《新》1920-5-27）

第三点，巨大的语言歧异。

中国语言的歧异，在国语运动中，作为论证国语统一、国语推广之必要性的证据得到较为充分的讨论。在对这一点的认识上，多操闽、粤、客方言的南洋华侨更是体会深刻，但与国内有区别的一点是：在与友族杂处的环境中，由“乡音”不同造成的侨民之间的感情隔膜、不睦以及按方言不同各自办学等现象，让作为统一认同群体的“华人族群”被友族嘲笑，是当时一些人士呼吁“学习国语”“统一语言”的一个重要理由。

关于侨民的语言歧异及其给华侨社会带来的不便，在菲律宾从事国语推广数十年的北京人伊静轩在《七十年来的菲华国语推行运动》（1973）中有详细介绍：“自清末至民初，埠中尚无其他华侨学校，本校学生系闽粤兼收。而国语在当时，犹未普遍，因方言之不同，故粤籍董事提议另开粤籍学生班，聘粤籍教师，专教粤籍学生。至于教授英文，则仍与闽籍学生混合上课。同属国人，因言语不一，于汉文则闽粤分级而教，于英文则同堂而读，不特可笑亦复可叹。”“因侨社大多数侨胞，不懂国语，所以在举行各种纪念大会时，演讲者必须请人翻译。除了翻译福建话以外，还要翻译广东话，往往在开会时间拖延很长，至感不便。”“那时华侨社会有一种堂斗的风气（西报每每张大其词，称之为‘堂会战争 Tong war’），动不动就成群结伙大打出手。打斗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语言不通，发生误会，亦为其中原因之一。”

“华族昔南渡，筚路启山林；橡风椰雨地，劳动生黄金。国力莫及，外患已深，言语分畛域，识者倍忧心。一炉而共治，国语是正音。同声，同调！同德，同心！”（《新嘉坡华侨国语学校校歌》）这里体现出这样一个逻辑：“言语分畛域”是国家落后的原因之一，要达到“同德”“同心”，进而国家富强，“同声”“同调”的国语统一势在必行。这是当时“教育救国”思想的一种体现。

3. 机构

国语的推广和传播，需要教育机构和社会、学术团体来实施、服务。就南洋的情况而言，在国语推广过程中，实施机构主要是学校和国语讲习所，相关的服务机构主要是华文报社和书店等。这与当时中国国内区别不大。但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的是，在使用不同语言、多族群聚集的南洋，这些机构的数量、分布如何，华文学堂的师资来源、所用课本、教学语言及课程设置如何，等等。这些对于我们认识南洋早期国语推广及华文教育的性质至关重要。

先来看学校和国语讲习所。

黎锦熙（2011/1934：160）提到1919年的《国语统一进行方法》议案，文中明言：“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当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作传布国语的大本营。”由此可见，学校尤其是小学及其所用课本在国语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在《新国民日报》上，关于学校在国语推广中作用的论述比较多见。例如：“欲语言统一，非普及教育，无以收其功。”（《平民求学之机会》，《新》1922-10-21）《南洋中华国语统一总会开发起人大会纪》（《新》1930-4-1）签名的发起人团体包括华侨中学、中华女学、星洲幼稚园、中华国语学校等三十余所学校。下面的这则记载，凸显了华校教育对于国语（华语）推广及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意义：

（5）仰光函云：余（访员）某日偕友人偶往直塘和源号内访友，忽瞥见两幼童华装玩耍于店前，友人见其性和可爱，乃执其手而问以华语，竟能以华语还答。友人戏谓：“若尔缅甸装，当给尔饼。”该童摇头不应。复问其故，乃答谓：“我是华人，若缅甸服则为缅甸类，岂不羞死。”……又闻某君云：“此幼童曾入华校数月，故有祖国之观念，是由于受教育得之者。反观彼等，言缅言、服缅甸，行走道上，施施然以为得意，不知祖国为何物，不知尊重国体，宁不羞死！”（《教育之感化力》，《新》1919-12-15）

二十世纪初，南洋华侨教育逐渐完成从私塾教育向新式学校教育的转变。从学校数量及办学类型来看，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的南洋华文学堂具有“数量多”“类型丰富”的特

点。据《去年海峡殖民地华人注册学校之报告》（《新》1925-7-13），新嘉坡、檳榔嶼、马六甲、纳閩四地，注册的华人学校总数为291所，教员总数732人，学生总数15418人，数量不可谓少。就办学类型而言，从《新国民日报》来看，使用国语教学的学校除一般小学、中学和专门的国语学校外，还有或独立或者附设的“半夜学校”“半日中文班”“国文特别补习班”“国语夜学”“国音夜学”“注音字母夜学校”等。一般的学校服务于正常求学的侨童，夜学或补习班服务于成人及在英文学校等处求学的学生。来看下面的记载：

（6）本坡熊时元君等所创办之五育补习学校，……因其为补习性质，又不限学生之年龄、职业、籍贯，随各人之程度高低，日夜皆可分级教授，且完全用国语，不用方言，故一般青年工人、商店伙友与求上进之学生，均称便利，报名者极为踊跃。（《“又多一学校”续讯》，《新》1925-2-26）

（7）本校为普及教育、统一语言起见，特多设国语半日班，由午后一时半至三时半，分小学、师范两级。学科：国语，分读法、作法、书法及信札。……星洲大坡尼律八拾三号静方女学校启。（《静方女校招生广告》，《新》1930-1-7）

这些不同类型的华文学堂，除了人口集中的“大埠”，在当时的一些华人数量不多的“小埠”上亦有分布：“然自民国成立后，南洋华侨初而提倡兴学，继而建设学校，迄今无论大小各埠、荒僻村落，都有我华校之设。”（《南洋华侨之兴学热》，《新》1924-2-27）再如：

（8）余往马打山，至亚冷名小驻。……傍有学校一所，学生二三十，适经课授时，余仅在校外参观。该教员操国语教授，腔口颇似北音，讲解精细。后听该学生讲法读法，亦均操国语，字句明白，颇有精神。如此侨童，或不至为巫风所同化。该处侨商、华人不多。（《亚冷名商学状况》，《新》1923-6-6）

就学校师资尤其是国语师资而言，早期南洋华校的老师多来自中国，“教师南来”“教师归国”“教师临别慷慨”“介绍教员”等新闻、广告等屡见报端。伊静轩（1973）也提到，“菲律宾华侨中学，遂于民国十二年在马尼拉

正式开办。当时华侨中学的教师以江浙人居多，教授课业均用国语。”1919—1933年《新国民日报》所刊登的上百则各地华校“教师征聘启事”，90%均要求“完全国语教授”“谙普通话”“普通话纯熟”“国语纯熟”“国音纯正”“善操国音”“读音纯照国音字母”等。以下是几则不同地区华校的“教师招聘启事”：

(9) 本校欲聘普通科教员一位，以能完全国语教授及谙闽粤语者为合格。每周担任教授卅小时，月奉修金七十元，膳费在内。……巴生呀岳峇都益智学校。（《新》1920-1-12）

(10) 敝校欲添聘教员一位，教授英文及其他学科，以英汉文能直接翻译兼谙普通话者为合格，除膳宿费由校供应外，每月束修一百盾。……苏门答腊占碑中华学校启。（《新》1920-3-25）

(11) 本校现在要聘请一位教员，以有中学毕业程度，能担任图画、手工、音乐、体操等科及完全用国语教授者为合格。……暹罗宋卡国民学校董事部启。（《新》1924-6-16）

(12) 敝校系高小学校，拟聘十九年份男校长、女教员各一位。资格高中以上毕业，国音纯熟者为合格。男任国语、算学、图画等科，兼精英文科，每月薪金七十元。女任歌舞、刺绣及普通等科，月薪五十元，膳费概系在内。……彭亨北根公立中华学校董事部启。（《新》1930-1-7）

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南洋早期华文学校对教师的要求充分考虑到了学生的方言背景以及住在地社会语言需求。华文教育要想长远发展，师资还得立足于自身培养，今天的东南亚华文教育依然面临这一问题。南洋早期部分华文学校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增办“师范班”，一方面增加师资，一方面弥补“南来”师资的“缺点”：“以教育之机关而论，方言互用，教材杂投。……以教育者而论，……来自祖国者虽通于教育但不悉侨情，侨生南岛者虽悉侨情而不通教育，而且，前者多通汉而不通英，后者多通英而不通汉。因为这种缘故，所以我们要培养出一种国语纯熟、品学兼优、中西并通的师资来。”（霹雳和丰兴中学校《本校增办师范科的宣言》，《新》1928-1-18）

在对南洋华侨早期国语推广梳理的过程中，我们认为有一个问题需要重新认识，那就是早期华文教育或国语教育的性质。目前一般认为，早期华文教育或者国语推广，就是母语教育。这没错，但不够准确。从南洋早期国语教育的文献来看，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传承语性质的母语教育。根据 Montrul (2016: 2)，传承语是一种母语，是文化或民族语言上的少数民族语言，通常为移民及其子女所使用；它存在于双语环境中，其中有另外一种具有社会政治优势的多数民族语言被使用。受输入的质与量、实际社会使用、语言声望等因素影响，传承语者的传承语能力跨度极大，从母语到仅在某些语言技能上具有一定的能力不等。从这个角度及早期华文报章对国语教育、华文教育的记载来看，我们可以说，由于侨民的“蓬飘”“寄居”身份和受当地社会政治及语言环境影响之原因，其以学校为主要阵地的国语教育具有强烈的“传承语教育”色彩，或者说，总体而言，其本质上就是一种传承语教育，或者说祖语教育（郭熙，2017；李计伟，2019）。

受住在地社会语言环境影响，或为生活、形势所迫，南洋早期的华校学生，注重住在地主要语言者众，尤其是殖民者语言（英文与荷文）。从语言能力来看，传承语者是双语者，或共时双语，或继时双语，双语能力多不均衡，传承语能力差别较大。《（吉隆坡）政府拟华童补习英文办法》（《新》1925-7-8）对华校学生的分类充分说明这一点：“华人学校生徒，计分三类：（甲）自幼即在英文学校肄业英文，希望受英文完全教育，仅于课外时间，往中文学校补习中文。（乙）自幼即肄业于中文学校，希望受中文完全教育，多数更希望稍习英文，程度以能达到通晓商业英文为目的。（丙）自幼即在中文学校肄业，望能在十岁或十一岁时，在英文学校习英文。”这三类学生，甲类和丙类是典型的汉语传承语者，其分别在于学习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的起始点不同，乙类则接近于完全的汉语母语者。再来看下面的记载：

(13) 本校自开办以来，各处学生来学者极为踊跃，惟向在英文学校读书学生每欲来学，其英文、算学已至四五号者，尚可合格，独国文一门，较之肄业中国学校者相差极远。

……本校为提倡国学、广育人才起见，拟专开国文特别补习科一班，额数四十名。凡在英文学校而有志学习国文者，幸勿失此时机。兹将须注意各点列下：（一）资格：凡在英文学校已读至三号而年龄在十三岁以上者，无论曾经学过国文国语与否，均可受试。（二）学科：实用国文语法、读法、写法、作法。（《南洋华侨中学校国文特别补习班招生广告》，《新》1919-10-30）

（14）华校在日间加授英文，……学生之注重英文者，中文必受影响而退步。……既而提议华校加授荷文，以应环境之需要。……华校教育之远逊于荷华学校者，实因荷文较为适用，吾人不必过于泥守国家主义，亦勿令以回国升学为目标，仅仅加授英文，华校确有加授荷文之必要，深望华校与荷华发生密切关系，荷华宜加授中文，视地方情形而变通办法云。（《日惹〈华侨教育会议续志（二）〉》，《新》1925-1-18）

（15）将中文学科，编在午前，英文学科，编在午后。……各学生父兄以子弟往英文学校或中文学校就学，每感不便，因各校或只授英文，则学生须另寻习中文之时间。……如在中文学校读书，则将来学生毕业后，谋生亦不容易。今培正学校，能授学生以半日中文，半日英文。（《星洲培正学校改组》，《新》1926-8-9）

这几则信息，说明部分华校适应当地社会语言环境，“特别注重英文”“加授英文”“加授荷文”“各校或只授英文”之同时并尽力教学国语的事实；从传承语教学的角度看，这是传承语者的传承语能力跨度极大的主要原因。

作为推广国语的专门机构，国语讲习所在南洋地区也有分布，其师资与学校一样，多来自中国；从数量上来讲，南洋的国语讲习所较为少见，其教学对象主要是失学者和社会成人。例如：

（16）邦咯小埠，地属奇甸，吾侨居此者亦不多。惟鉴吾人之交际，同是国人，因语言互异，致彼此畛域，非急设法，以图补救，不足以为功。爰集该埠诸热心家商议，现筹有基金，创设鼎新国语讲习所培养青年子弟，以备中年失学者，统一言语。（《邦咯鼎新国语讲习所之告成》，《新》1919-10-1）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南洋早期的学校教育，主要以小学为主，受制于师资、经费等，能够办到中学及其以上者较少。所以，当时中国广东、上海、南京、厦门等地的中学、大学对南洋子弟招生，“鼓励及指导海外华侨子弟回国求学”（《中国大学院华侨教委会组织大纲》，《新》1928-1-31），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语在南洋的推广。

再来看华文报社和书店。

东南亚是华人最为集中也是华文报刊最为集中的地区。1815年创刊于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是海外各地最早的华文报刊，被称为“华文杂志的鼻祖”。1927年中国《教育杂志》第19卷第2期上有一份“南洋华字日报调查表”，内中提到分布于荷属棉兰、荷属巴达维亚、荷属三宝壟、荷属泗水、荷属西利伯、英属新加坡、英属檳榔屿、英属吉隆坡、英属缅甸、美属菲律宾、法属安南、暹罗等地的华文报纸27种，本文所主要依据的《新国民日报》亦在其中。这些报纸，进入民国政府时期，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越来越多的内容采用白话文书写，这对国语及其社会应用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报纸就是函授的，学校就是面授的，不过函授与面授的区别。”（《报纸与学校》，《新》1921-11-24）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报纸与华侨》（《新》1919-10-1）这篇社论，明确说明：“然欲使吾侨之爱宗邦之观念由弱而转强者，舍报纸之力不为功。……用浅近的文法、纯正的意思，引诱吾们侨胞。”同时，报纸上所刊登的关于“国语统一”“国语论争”“国语教学法”乃至“世界语”的新闻与介绍，如张士一《国语统一问题》（连载）（《新》1921-4-26—5-12）、蔡元培《练习国语的利益》（《新》1927-11-15）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国语，影响着人们对于国语推广的认识。

学校对于国语推广的重要性，首要方面就是其所采用的课本。中国两家著名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在当时的新加坡均有分社，其广告也频繁出现于报端，当时南洋华校所用之教材亦多来自这两家出版社：“华侨学校向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所出版之教科书。”（《星洲华校对南洋华侨教育会议

之提案(二)》,《新》1929-5-24)1921年12月1日《新国民日报》第8页有中华书局广告一则:“诸君要讲国语,先要听熟国语的正音。国语学大家王璞先生的正音,国语留声机片,全套七十四元。国语留声机片课本,全一册,三角。”1932年10月26日《新国民日报》第1版有“商务印书馆国难后之出版物(经英属七州府提学司、荷属汉务司审定)”广告一则,内种提到“(小学校用)国语教科书(编辑者沈百英,校订者张国基,共八册)”,“(小学校用)南洋常识教科书(编辑者赵景源,校订者张国基,共八册)”,“(小学校用乡土教材)自然课本(编辑者陈问樵,校订者沈厥成,共四册)”。这套由华侨教育家、中国出版家及侨居南洋的作家、学者合作编写的教科书,既紧扣中国标准,又“依照南洋情形(笔者注:此为广告语)”,采收“南洋特殊材料(笔者注:此为广告语)”编撰,可以说是具有“当地化”色彩的教材。再来看下面这则记载:

(17)各学校总理、校长先生公鉴敬启者:本年秋季开学应用之书籍、图画、仪器、文具等件,敝分馆已于上月中旬大帮运到,足应各地各校之需,倘承惠顾,即可照发,决无延误。……新嘉坡商务印书分馆谨启。(《商务印书馆启事》,《新》1925-7-15)

应该说,当时南洋华校的教材主要来自中国,并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当地的具体情况;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于锦恩等(2011)。这些使用当时国语编写的课本,通过广大华校的使用,影响了年轻一代的华侨青少年,而这也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来东南亚华语书面语的基础。

4. 效果

南洋早期华侨的国语推广,其效果如何?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看局部的、个别的论述。前文我们曾简单论述过早期国语教育的性质——汉语作为传承语的教学,而传承语的最大特点,就是其使用者对传承语的精通度个体差异巨大。前文征引的一些文献已经表明,有的华侨学生“均操国语,字句明白”,有的则“与土人毫无界别”。

1929年,老舍先生离开英国,在新加坡滞留半年,在发表于1934年的散文《还想着它》

中,有所见的当时南洋地区语言使用情况的记录:“学校也很好。学生们都会听国语,大多数也能讲得很好。”“顶可笑的是在南洋各色小孩都讲着漂亮——确是漂亮——的北平话。”1930年1月7日《新国民日报》第6版登载的《华侨国语学校开校典礼纪盛(二)》中也提到了老舍:“舒舍予先生演说谓:吾自英京伦敦回来,曾在该处任大学院国语教授五年,……对于陈树南医生言辞极表赞同云云。”这记载了老舍先生参加华侨国语学校活动并呼吁大家学习国语的情况,其后来的散文是对那段见闻的记录。如果单就老舍先生的记述来看,南洋华侨学生的国语水平是很高的——“漂亮的北平话”。但这只是新加坡一部分学校的情况,如果考虑到整个南洋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受制于居住地社会环境,华校多以双语或多语教育为主,不同类型的学校对国语的重视程度不同;一些地区华侨子女入他族学校者远多于入华校者,地区差异大;总体而言,采用国语教授的学校属于少数。来看如下记载:

(18)山口羊培南学校,……此次该校国民班举行毕业式,……五由毕业生三人答词,一操英语,一操国语,一操南音,语颇流利,坐座者神为之一动。(《山口羊培南学校举行毕业式的盛况》,《新》1923-2-20)

(19)统观本岛各埠学校之状况,在华侨方面的,多数以国语教授,课程符合国内部章,宜矣!但对于英文一科,未免略逊,而教会方面独缺国语一科,且注重英文云。(《英领北婆罗岛华侨教育概况》,《新》1928-1-21)

(20)巴城附近二十五公里以内,华侨总数不下七八万,所设立之学校,华文日学校,……统计学校廿五间,男女学生共约三千,男生约二千,女生则仅约一千而已,男教员约共八十人,女教员约共三十人。……华侨子女入荷巫各校肄业者,闻共至七八千人以上,比之华校,不啻多二三倍。……较之华校,其收费之多,常至数倍。记者尝细考华侨之所以多喜欢送子女入荷巫校去的,实有两大原因:其一因祖国纠纷日久,夷而列于次殖民地地位,国已不足以庇民,民(尤其是侨民)之于国,亦日冷淡。……其二因生活所迫,同为具两手一脑的人类,白脸皮的,每日所得,多至数十盾,黄脸皮的,每日所得,少或不及半盾。

……吾意特欲一般华侨习外国文，须先通解本国语言文字，最低限度，亦要读外国文之后，再补习华文，然后才配称是华侨。否则，不如直截了当称是土著巫来由人。（《爪哇巴城华侨学校最近底概况》（二），《新》1928-1-17）

（21）国语教授，国内已尽量推行，南洋华侨学校，亦有采用之者，惟据调查所得，当属少数。如广东、福建各省所办之侨校，每藉口于学重，不能国音，仍须土语教授，甚且采用巫语，不一而足。（《学校教授宜用国语》，《新》1929-9-28）

Montrul (2016) 和 Polinsky (2018) 均指出，判定一种语言是否是传承语的关键因素就是所在地的社会语言环境；通常，传承语是双语环境中的少数语言，移民社区是典型的传承语社区。无疑，从早期报章文献来看，南洋早期华侨对于国语的学习及其学校教育，是符合这些特征的。

另外，南洋华侨多来自中国南方闽、粤、客方言区，即使学习国语，在发音上亦很难达至标准，这一点《南洋小学读音与国语之商榷》（《新国民日报》1920-1-30）一文已经指出：“读音宜用国音：今日南洋各小学校，除一二小部分私立者外，读音固皆用普通音矣，然其所谓普通音者，是否即全国统一之国音，尚难判断。”从国语推广的效果而言，在整个南洋地区，书面语的统一性要远大于口语的统一性，今天东南亚地区各华语变体依然如此。

5. 影响

关于南洋华侨国语推广的影响，要放在南洋地区华语形成与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来考量，但“华语的形成与发展”这个话题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与研究，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历时材料。本文通过对《新国民日报》数十年语料的阅读，可以追寻到国语推广深远影响的一些线索，比如在当时的报纸上使用的一些词语或结构——同时也是当时中国现代汉语常用的，今天依然活跃在新、马华语中，而它们在今天的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却消失或不常见了；如此，这些词语或结构成了如今新、马华语的特征。无疑，这种现象是以学校和华文媒体为主要阵地的“国语推广”随着代际传承保

留到今天的结果。限于篇幅，来看三组特别的例子：

（22）a. 在中国经济经历“L型走势”当儿，50.9%的企业家认为宏观经济“偏冷”，47.8%认为“正常”。（《央行调查：五成居民叹房价物价高》，新加坡《联合早报》2016-09-19）

b. 在庆祝57岁的诞辰当儿，我们只能祈祷，会有越来越多的各民族年轻人胸怀民主开放，愿意跨越种族的藩篱，共享国家的财富。（《57岁的庆典》，马来西亚《光明日报》2014-09-02）

c. 当我在一个很热闹的场所的当儿，得着伊同样的这么秋波一转，我那蕴着的心弦颤动了。（吉隆西神《生命史中的一页》，《新》1916-4-20）

d. 于这当儿，大家都表示心欢意足了。（余远昌《吃玫瑰酥糖之一夜》，《新》1929-1-28）

e. 马老先生漱口的当儿，马威把昨天晚上来的箱子打开，问父亲换衣裳不换。（老舍《二马》）

f. 在这个当儿，我看见了大蝎，他离河岸最近，差不多离着那群人有一两丈远。（老舍《猫城记》）

在今天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华语中，有一些儿尾词，最常用者就是“当儿”，如例（22a）和例（22b），这个词在今天的普通话中已极少使用。东南亚华语的使用者，多为中国南方闽、粤、客方言背景，汉语南方方言并无儿化，那么这些儿尾词从何而来？祝晓宏（2016：38-39）指出，新加坡华语会在无需用“儿”的地方使用“儿”，发生“过度概括”，这反映了新加坡华语在模仿普通话方面的一种倾向。例（22c）~（22f）显示，“当儿”在早期华文文献及早期现代汉语中均常用，这表明今日东南亚华语中的“当儿”应该为早期国语之遗留，而非模仿普通话所致。

周清海（2002）提到，新加坡华语书面语里形容词有些用为动词，和普通话不同，举的例子中有“亲爱父母和兄弟姐妹”。陆俭明（2018：401）在论述新加坡华语“形容词用作动词，带宾语”时，也提到了“亲爱”，如“亲爱父母和兄弟姐妹，就是仁的表现”，认为

“形容词用作动词，带宾语”是中国普通话里近年来也有的发展趋势，至于“亲爱父母和兄弟姐妹”是“与父母和兄弟姐妹相亲相爱”的意思，中国普通话里似还没有。其实，“亲爱”在老舍作品及早期华文报章中均有动词用法，可以带宾语。如：

(23) a. 吾侨远涉重洋，至此谋生，见有同国同省之人，理宜互相亲爱。（《噫！书不尽之姓氏蛮斗》，《新》1921-10-17）

b. 常想人人相亲爱，人人亲爱总难能，难能偏作必能想，为此难能痛恨深。（《海畔感怀》，《新》1925-10-21）

c. 女儿都是陪钱的货，老先生不愿偏疼孙子，但是不由的不肯多亲爱孙女。（老舍《新时代的旧悲剧》）

d. 这一点使他恨振华的心思改为佩服她，亲爱她，并且自己也觉到一种刚强的，自爱的，自尊的，精神。（老舍《文博士》）

如郭锐（2002：228）所言，“亲爱”的区别词（或形容词）用法是由其动词功能衰减而来的。据我们的考察，现代汉语中，“亲爱”动词用法的消亡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而在新加坡华语、马来西亚华语中，“亲爱”的动词用法则一直沿用至今。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华语中，“说”“讲”等言说动词与“商议”“联络”等协同义动词能受介词短语“向NP”修饰，组成“向NP+VP”结构，如例（24a）~（24c）。祝晓宏（2016：100）提到了新加坡华语中的“向警方联络”“向妈妈讲”，认为这两个短语中的“向”在普通话中要换成“跟”或“和”，这是新加坡华语中“介词的窜用”现象。其实在早期南洋华文报刊及早期现代汉语中，这是介词“向”常见、正常的引介功能，如例（24d）~（24i）：

(24) a. 他今日向《星洲日报》说，渔业局官员为峇拉煎虾渔船检查时，允许在他们的表格上填上这是峇拉煎虾渔船。（《村长王雅霖：怕执照吊销？双怡杖浅海渔民忍痛换网》，马来西亚《星洲日报》2013-11-14）

b. 他说，吉州国阵已向两州赈灾委员会秘书处联络，目前等待对方安排吉州义工团进入哪区灾区赈灾和协助善后工作。（《慕克力：不满赔偿金，居民拒迁防洪受阻》，马

来西亚《光明日报》2015-01-05）

c. 厂商高层向员工交涉不果后，离开宿舍门口。（《合约期逝世获赔薪？外劳罢工骚乱平息》，马来西亚《光明日报》2014-08-24）

d. 母亲转身向我说：“读给我听，说什么？”（《水客带来的东西》，《新》1927-4-15）

e. 诸商翁如有求购高丽参者，无论趸发、零售，务祈向本号代理人益成公司锦利号商议价目，格外从廉。（《高丽真参》，《叻报》1917-02-05）

f. 诸君无论要买进什么，要卖出什么，要介绍什么，或要委托什么，都可向该机关接洽。（《大发财机》，《新》1920-04-22）

g. 他忘了身上没有一个钱。摸了摸衣裳，他向车夫说：“等一等，给你拿钱。”“是了，先生，不忙！”车夫很客气的说。（老舍《四世同堂》）

h. 可是作家自己没法向别人交涉，因为没有法令可根据。（老舍《怎样维持写家们的生活》）

i. 老张说：“孙八已经肯出一千元。”龙树古说：“一千出头才肯商议。”老张答应再向孙八商议。（老舍《老张的哲学》）

在今日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书面语中，早期国语使用而今日普通话已经消失或不常用的词汇语法现象是比较常见的。无疑，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传承语的保守性”（Montrul, 2016: 239; Polinsky, 2018: 11）而从早期国语传承到今天的，关于这一问题，更多的例子可以参见李计伟（2018a, 2018b）和李计伟、张翠玲（2019）；这显示了早期国语推广在南洋地区的影响。

6. 结语

东南亚是全球华语研究的重点区域。目前我们已经大概知悉了东南亚华语的基本面貌，尤其是其相对于当前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典型特征，但这些特征从何而来，就目前的研究来看，还缺乏有一定纵深的历时考察，而要展开东南亚华语研究的历时维度，进行“华语史”的研究，南洋华侨早期国语推广又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

本文依据早期华文报刊及相关文献，从“缘起”“机构”“效果”“影响”等四个方面较

为全面地论述了早期国语在南洋地区的推广情况。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我们想重点强调两点:一是南洋地区早期国语推广或者华文教育的传承语教育性质,二是南洋地区早期国语推广奠定了后来东南亚一些国家华语书面语的基础。有了这两点,我们就可以将海外华语的形成、现代汉语的发展、与传承语习得理论等课题结合起来,从而对海外华语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

[参考文献]

别必亮 2001 承传与创新——近代华侨教育研究[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刁晏斌 2017 论全球华语史及其研究[J]. 全球华语(Global Chinese)(2).
 郭锐 2002 现代汉语词类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郭熙 2017 论祖语与祖语传承[J]. 语言战略研究(3).
 黎锦熙 2011/1934 国语运动史纲[M]. 北京:商务印书馆.
 李计伟 2018a 大华语视域中“帮忙”用法的共时差异与历时变化[J]. 汉语学报(4).
 —— 2018b 东南亚华语视角下的现代汉语词汇变化研究[J].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21).
 —— 2019 《传承语习得》述评[J]. 外语教学与研究(2).
 李计伟,张翠玲 2019 传承语的保守性与东南亚华语特征[J]. 华文教学与研究(3).

李宇明 2017 大华语:全球华人的共同语[J]. 语言文字应用(1).
 陆俭明 2018 新加坡华语语法[M]. 北京:商务印书馆.
 苏培成 2010 当代中国的语文改革和语文规范[M]. 北京:商务印书馆.
 王惠 2007 从两岸三点教材辞汇差异看海外华语教育[J]. 台湾华语语文教学(3).
 吴英成 2010 汉语国际传播:新加坡视角[M]. 北京:商务印书馆.
 徐威雄 2012 马新华语的历史考察:从十九世纪末到1919年[J].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15).
 姚敏 2017 中国华文教育政策历史研究:语言规划理论透视[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伊静轩 1973 七十年来的菲华国语推行运动[A]. 载马尼刺中西小学校七十周年纪念特刊[C]. 马尼拉:马尼刺中西小学校.
 于锦恩,蒋媛,鹿牧 2011 国语教材《新编南洋华侨高小国语读本》简析[J]. 海外华文教育(3).
 周清海 2002 新加坡华语变异概说[J]. 中国语文(6).
 祝晓宏 2016 新加坡华语语法变异研究[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John Edwards 1985 *Language, Society and Identity*[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Maria Polinsky 2018 *Heritage Languages and Their Speaker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ilvina Montrul 2016 *The Acquisition of Heritage Languag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n the Promotion of Mandarin Chinese in Early Nanyang

Li Jiwe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10, China)

Key words: Nanyang; Early; the overseas Chinese; Mandarin popularization

Abstract: Southeast Asia is a key region for global Chinese studi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basic facts of the promotion of mandarin Chinese by overseas Chinese in early Nanyang from four aspects: origin, organization, effect and influence.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the promotion of mandarin by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early Nanyang was a heritag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mandarin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written Chinese language in Southeast Asia today.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we can combine the form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and the acquisition of the heritage language so as to obtain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责任编辑 张耀文】